清军入关前女真族的经济潜力

(美)袁 清

在评述清军入关这一重大事变时，过去史家多着眼于其军事上的成功以及李自成农民起义对明朝政府的打击，实际上，在入关前，女真族的经济已有相当的潜力，是清军取得军事胜利的重要物质基础。本文拟从三方面对清军入关前的女真经济作一评述，以就正方家。

一、女真的经济及与汉族的贸易

十六世纪下半叶，在满族开始形成时期，其农业生产是在比较稳定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同时，依靠传统的狩猎、牧畜和采捕生产获得珍贵的产品，以此加强与汉族的贸易活动，获得其军事和农业的必需品。

(一)女真的经济基础

女真族的早期经济以农业和狩猎为主，明代后期以建州、海西女真为主的女真人，在汉族影响下，农业经济已成为其主要经济事业。至万历年间，女真的农业生产已有很大发展，上好的土地"则粟一斗，可获八、九石"①。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 年)起兵后，更抓紧农业生产，由部落酋长负责屯田，积极扩大耕地面积，首都赫图阿拉周围"无墅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②。随着统一事业的发展，更进行了扩耕。皇太极在位时，提出农业是"国之大经"的根本思想，把发展农业和取得战争胜利看得同样重要。为发展农业，他减轻人民劳役，防止滥役民夫；不荒废土地和劳力，坚持代耕、助耕；屯田辽西，以农养战，既利于征明战争的顺利进行，又减轻人民的负担。这个时期，后金的社会经济已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皇太极晚年已能够达到"地广粮裕"。

女真地区特产资源丰富，发展农业的同时，狩猎、牧畜和采捕生产仍然在广大的女真地区占有重要地位，由此获得的人参、珍珠以及狐、貂、鼠等皮毛产品成为与汉族贸易的主要物品。

(二)铁的冶炼

仅有农业、狩猎还属于比较落后的经济形态，据《李朝实录》记载，直到建州三卫时期女真地区还没有铁，铁武器一直由明辽东和朝鲜输入铁制造，而铁农具则直接向明朝交换，交换不到就发动战争进行掠夺。建州在"定国政"后，开始冶铁，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始开金银矿及冶铁"③，并用好铁制造武器。努尔哈赤时期，女真地区已能生产犁、铧、锄、刀、铲等农业工具，对外不依赖明和朝鲜。

(三)对汉族的贸易

除去女真自身的生产活动外，在明代，汉族与女真族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活动已成为双方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女真人用多种土特产换回粮食、布匹和铁制农具。汉族同样需要与女真的贸易则出于两个原因：通过贸易实行对女真的"羁縻之策"，这是政治原因；通过贸易获得马匹等军用物资及人参、貂皮等高级消费品，可谓经济原因。

甲、马市

所谓马市，是明朝政府为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与汉族进行商品交易而专门开设的一种定期性贸易场所。汉族与女真的贸易活动主要是通过马市贸易这一形式进行的。

永乐四年(1406 年)三月，明政府根据蒙古族的要求，正式“设辽东开原、广宁马市二所”④，第二年，明朝政府规定，女真族与蒙古族一样，“来朝及互市者，悉听其便”⑤。马市分为官市和私市两类：明朝政府在马市中收购马匹，以备军用，称为官市；汉族和女真各部民间私人贸易称为私市。官市马匹，由明朝政府经营，并且规定马匹价格，“定直四等：上直绢二匹，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递减”⑥。私市则更为繁盛，女真在私市中售出的商品有马、牛、羊、驴、猪等牲畜和各种野兽毛皮及人参、木耳、蘑菇、松子、蜂蜜等山货。汉族地区输出的有各种铁制农具和米、盐、布匹、绢绸、铁锅、衣服等生活资料。

明代后期，女真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进步，马市贸易更为发展。马市场所陆续有所增加，至万历时期除原设的开原、广宁外，又有抚顺、清河、瑷阳、宽甸、义州等处的设置。马市开市日期也大为增加，明初每月为一至二次，至嘉靖，大约是每隔三、四天一次，据辽宁省档案馆明档《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两表册》的不完全记载，万历十二年马市每月开市日期为初二、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初十、十二、十三、十五、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达十七次之多。马市中交换商品的数量也增加了。万历年间，仅一次马市就成交铁器铧子 4292 件。海西女真一次交易，就有貂、狍等皮 756 张，人参 518 斤，蘑菇 337.5 斤以及锅 42 口，铁铧 1003 件。

可以看出，马市贸易极大地推动了女真经济的发展。

乙、人参贸易

清军入关前，出售人参已成为女真收入的一条重要经济来源。人参也主要是通过马市进行贸易，据明档记载，万历十一、十二年，仅在广顺、镇北二关贸易中，海西女真售出人参高达 3619 斤之多，计值白银三万余两。据《武备志》一书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7 年)，明朝御史熊廷弼禁绝对建州女真的马市贸易，二年之内，建州女真腐烂了十余万斤的人参。据《清朝人参管理》一书记述：女真向明朝政府的进贡于 1609 年停止。原因是 1608 年，努尔哈赤坚持由明朝政府控制汉人，不让他们随意收集人参，但明朝政府控制不了。女真抓到非法贸易的汉民后就杀掉，引起明朝政府的不满。1618 年，女真与明朝发生战争，边界贸易停止，明朝就到朝鲜获取人参，可是，朝鲜之产不够明朝之需，因此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女真人、朝鲜人和汉人之间的非法人参贸易，例如，明朝将领毛文龙拥有四、五万将士，驻扎在鸭绿江口的岛上。朝鲜给毛提供很大一批人参，可他仍派下属到女真地区、朝鲜非法收取人参，与女真人又有广泛的非直接的贸易往来，又将几千斤人参卖给汉人。毛文龙虽是女真的敌人，但却在与女真的人参贸易中获利⑦。

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汉族人参贸易的控制与反控制中，女真人掌握了人参贮存法。据《清太祖实录》卷二记载：“曩时卖参与大明国，以水浸润，大明人嫌湿推延，国人恐水参难以耐久，急售之，价又甚廉。太祖煎煮晒干，诸王臣不从，太祖不徇众言，遂煮晒，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人参技术的改进，使女真获得了加倍的经济效益。

二、女真族与朝鲜的贸易关系

女真族与朝鲜的贸易对女真经济发展亦有所刺激。其贸易所于"镜城、庆源，……唯铁只通水铁"⑧。建州三卫与朝鲜民间的互市更为频繁，由于朝鲜王公贵族上层"俗尚奢侈，服饰必须用貂鼠皮"，"少年妇女，皆服貂裘，无此则羞与为会，数十妇女之会，无一不服者"⑨。女真则以貂鼠皮与朝鲜交易，输入牛、马、锄、水铁农器、铁、鍮、铁、铁物、军器、谷物等。

女真与汉族的贸易主动权掌握在明朝手中，他们可以随意关闭关市，又有许多"抽分"，与朝鲜的贸易就显得重要了。特别是民间私市越来越多，朝鲜政府虽多次下令禁止，均无效。

当女真人觊觎辽沈地区的时候，明朝政府对建州女真实行了经济封锁。1608 年停止了建州的朝贡，次年关闭马市，建州女真立刻出现了"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⑩的局面，特别是军队日趋壮大，需要更多的粮食。天聪元年(1627 年)，皇太极出兵朝鲜后，立即提出开市，每次朝鲜投入耕牛 140 头、犁 2600 个、釜 55 个、盐 850 石到市。女真人以武力开辟贸易市场获得急需的粮、盐、牛、犁等物，摆脱了由于明朝闭市而出现的困境。

三、先进技术的传播

十六世纪后期，在女真地区生活的汉族人，把诸多先进的农业及手工业技术传授给女真人。

(一)农业技术的传播

自明初起，就有不少汉人逃亡到女真各部，这些人或系"避差操罪犯逃窜者"⑪，或为生活所迫越边谋生者。据《明英宗实录》的记载，明前期、中期逃亡到海西、建州的辽东人已不算少。女真各部掳夺汉人的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一些越边汉人在女真地区"男婚女嫁，累代而居"⑫。

当女真人定居下来后，农业生产慢慢地发展起来，大量逃亡、被掳汉人推广牛耕，传播使用铁制农具。当时，在女真地区"(汉人)奴婢耕作，以输其主。(女真人)军卒但砺刀剑，无事于农亩者"⑬，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得以传播。朝鲜人申忠一到建州女真地区去，看到当时女真人家庭经济生活亦是"家家皆畜鸡、猪、鹅、鸭、羔、羊、犬、猫"⑭，几乎与汉区农户无大区别。在汉人的影响下，农业经济已成为女真人主要经济事业。

(二)手工业技术的传播

卫治设在开原的三万卫、辽海卫，都设置有炼铁千户所，拥有大量的冶铁工匠，这些汉人工匠逃亡、被掳到女真地区，传播了铸铁技术，而临边居住的女真人和寄住在辽东各卫的女真人，首先学会了改铸铁器。1468 年(成化四年)，朝鲜人刘德吉看到女真人以"箭镞贸大明铁自造"⑮，可见他们并"不解炼铁，但得正铁改造耳"⑯。建州、海西女真人进京仍旧"或至各驿索要铁杓等物，带至边外改作盔顶"⑰，说明改铸仍是女真人的主要手段。直至 1599 年(万历二十七年)三月，建州女真才真正"始炒铁，开金银矿"(18)，迈出从改铸到开矿冶铁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纺织技术及其它一些手工工艺也得以传播。这与女真对工匠采取保护和妥善安置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在一次捕获了乘刀船的"叛逃"汉民 86 人，"收养有用的工匠"(19)，其他人都杀了。后金还重视训练工匠，并在生活上予以优待。 (下转第 110 页)

不惜笔墨，重点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对山西近代化的影响。特别是对保晋矿务公司等民族资本和阎锡山官僚资本进行了整体研究。阎锡山作为一个出身于封建家庭，曾留学日本并统治三晋三十八年的“山西王”，的确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军阀，他有自己的一套经济思想。作者深入分析了阎锡山不遗余力地推行的“六政三事”、“村本政治”、“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和《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等经济措施，并从中可以看出山西畸重型产业结构及运行机构的的形成轨迹。如果山西近代史缺少对阎锡山官僚资本的研究，那将是不全面的。当然，不是为了写人而写人。“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12页）。

四、既有地方特色、又有全国意义。《山西近代经济史》虽是一部区域经济史，但其中的许多内容是中国经济史中重要的研究课题，仅以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大抗日根据地而论，作为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和抗日战略支点的山西根据地，其作用非同一般。由于山西根据地与阎管区、沦陷区犬牙交错，情况复杂，决定了它的经济与边区经济的差异性，因此对山西根据地经济史的研究就显得更为特殊和重要。再如，对晋商的研究也是如此。晋商作为明清之际崛起，并活跃于国内各大商埠和海外市场的国际性商帮集团，曾一度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山西商业、金融业的发展，不仅扩大了国内商品流通，促进了全国市场的发育，而且对中国近代银行业的产生以及沟通中外商品交流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研究晋商的产生、发展、经营管理、价值观念及其精神，对明清时期山西以至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运行特点、经济制度的形成、资本主义萌芽、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近代经济史》一书，于1995年2月山西经济出版社作为重点资助图书正式出版。该书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全面、综合研究探讨1840—1949年山西经济运行、发展轨迹、产业结构、市场运作以及阶级成份变化的断代经济史，也是填补空白，很有新意的开拓性专著。

（上接第92页）

结论：

综上所述，清军入关前女真族的经济潜力有这样几个特点：

1. 农业是其经济的基础。2. 马市、人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3. 女真与朝鲜的贸易有着特殊的地位。4. 先进技术的传播加速了女真经济的进步。5. 军事成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正是在这样一个经济背景下，清军完成了入关，从而确立清王朝的统治地位。

①、⑭《建州纪程图记》。
②《旧老城》页83。
③《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3。
④《明成祖实录》卷41。
⑤《明成祖实录》卷48。
⑥《明史》卷81(《食货志·马市》)。
⑦《清朝人参管理》页73、74；van Jay Symons，1981年版，页73一74。
⑧《李朝实录·太宗》卷11。
⑨《李朝实录·成宗》卷57。
⑩《清太宗实录》卷3，页26。
⑪《明英宗实录》卷103。
⑫《李朝实录·成宗》卷259。
⑬《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卷16。
⑮《李朝实录·睿宗》卷2。
⑯《李朝实录·成宗》卷52。
⑰《明神宗实录》卷373。
⑱《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⑲《满文老档·太祖》卷24。